

本地居民对外国移民的印象结构及其生产机制

——一项针对广州本地居民与非洲裔移民的研究

梁玉成 刘河庆

内容提要 本研究在梳理西方学界关于本地人对移民及移民现象的态度的理论解释基础上,提出在初期移民国家,由于外来移民的经济嵌入程度及生活空间均与西方国家有较大差异,以及本地人也未形成关于外来移民统一而稳定综合印象,因此区分对外来移民的印象结构,进而具体分析其形成机制非常必要。基于在广州市的实证调查数据发现:由于非洲裔移民并未真正进入广州劳动力市场,且以经商为主,因此不同类型的本地居民对他们经济影响方面的印象并无明显差异,本地人对他们的印象,主要由人们实际遇到的威胁以及感知到的威胁所决定,即感知到的非洲裔数量越大或者居住地越靠近非洲聚集区,越易产生负面社会生活影响印象,并与个体社会经济地位变量影响不大,而群体接触的正面效应则被否定。

关键词 非洲裔移民 广州本地居民 印象结构

梁玉成,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社会学系教授 510275

刘河庆,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社会学系博士生 510275

全球化使世界范围内的人口流动加速,同时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以及与各国交流合作的不断增多,越来越多的来自不同国家的居民开始进入我国,在我国城市社区尤其是“北上广”等特大城市,逐渐开始出现新的族群,较为典型的如广州的黑人群体等。外来移民的大量涌入不可避免的会对族群间的关系形成挑战,以欧美国家为例,尽管各国均不断倡导种族多元化与种族平等,但本地居民针对外来移民的敌对情绪及敌对行为仍较为普遍^[1]。然而,与有着悠久移民历史的西方国家不同,在我国,出现外来移民的时间相对较短,因此对于如何减少族群间的敌对现象、促进族群间的和谐共处,缺乏足够的处理经验以及实证研究,本文将尝试弥补这一研究空白,以广州这一非洲裔人口大量居住的城市为例,探究本地居民对于非洲裔的具体印象结构及其生成机制。

[1]Green EGT. 2009. Who can enter? A multilevel analysis on public support for immigration criteria across 20 European countries. *Group Process. Intergroup Relat.* 12(1):41-60.

一、文献综述与理论视角

与我国学界关于本地人对移民及移民现象的态度(attitudes toward immigrants and immigration,以下简称ATII)研究刚刚起步有所不同,西方国家有着上百年的移民历史(特别是美国),时至今日,每年仍有数百万人从不同的大洲迁移到发达国家^[1],2015年大量难民进入欧洲更是引起了世界范围的关注。由于移民大量涌入对于当地社会及居民造成了较大的现实压力,因此当地居民ATII及其具体成因,成为国外移民研究关注的一个焦点。

目前,国外学界主要从微观的个体层次以及宏观的结构因素两个方面分析对于本地人的ATII及其成因进行研究,包括社会经济地位与理性人假设、竞争威胁假设以及接触假设等理论解释。

理性人假设强调本地人负面ATII的产生,主要与个人社会经济地位以及自利性有关,低阶层的人往往会从实际出发,经过理性计算,惧怕外来移民会对其工作机会以及生活空间等形成竞争和威胁,从而更容易产生负面印象。国外许多研究证明了本地人的教育程度、收入以及职业等社会经济变量对于负面印象产生的显著效应^{[2][3]};但也有一些跨国研究表明个体的社会经济地位对于负面印象的预测作用并非在每个国家都显著,以教育程度为例,只有少数研究验证了教育的效应^[4],而在中国和东欧国家,教育的效应往往是不显著或大大低于西欧国家^{[5][6]};Mayda的研究则表明高职业阶层的人群更容易产生对于移民的正面态度这种效应只存在于发达国家,在一些欠发达国家,并没有这种正向效应^[7]。

接触理论美国著名心理学家奥尔波特最早提出接触有利于提升对于其他群体成员的印象,但他同时指出接触发挥积极作用需包括四个基本条件:即接触双方地位平等、双方相互合作、有共同的目标以及官方对于不同族群间交往的认同。部分基于实验方法的心理学研究证明,在满足以上四个条件的情况下,接触确实有积极作用^{[8][9]}。同时,Hamberger和Hewstone进一步区分了三种接触类型:(1)亲密接触,这种接触会导致朋友或亲属关系的产生;(2)偶然接触:会形成对于移民的表面的或零星的印象;(3)接触机会,不同的接触机会或频率意味着感觉到的移民的数量以及与移民接触可能性的不同^[10]。移民领域的研究沿用这一理论视角来解释本地人与移民之间的关系,如McLaren在研究中验证

[1]UN Popul. Div. 2009.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port 2006: A Global Assessment. New York: UN Publ.

[2]Pettigrew TF. 2000. Systematizing the predictors of prejudice. See Sears et al. 2000, pp. 280-301.

[3]Sides J, Citrin J. 2007. European opinion about immigration: the role of identities, interests, and information. *Brit. J. Polit. Sci.* 37:477-504.

[4]Hainmueller J, Hiscox MJ. 2007. Educated preferences: explaining attitudes toward immigration in Europe. *Int. Organ.* 61:399-442.

[5]李志刚等:《全球化下“跨国移民社会空间”的地方响应——以广州小北黑人区为例》,〔北京〕《地理研究》2009年第4期。

[6]Coenders M, Scheepers P. 2003. The effect of education on nationalism and ethnic exclusionism: an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Polit. Psychol.* 24(2):313-43.

[7]Mayda AM. 2006. Who is against immigration? A cross-country investigation of individual attitudes toward immigrants. *Rev Econ Stat* 88(3):510-530.

[8]Pettigrew TF. 1998. Reactions toward the new minorities of Western Europe. *Annu. Rev. Sociol.* 24:77-103.

[9]Dovidio JF, Gaertner S, Kawakami K, Hodson G. 2002. Why can't we just get along? Interpersonal biases and interracial distrust. *Cult. Divers. Ethnic Minority Psychol.* 8(2):88-102.

[10]Hamberger, J and Hewstone, M, 1997 'Inter-ethnic contact as a predictor of blatant and subtle prejudice: tests of a model in four West European nations',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vol. 36, no. 2, pp.173-90.

了在移民中有朋友或者熟人会提高本地人对于移民的印象^[1]；Escandell 等人在西班牙进行的研究，则表明本地人与外来移民（非洲移民、拉丁美洲移民）有亲密的接触或偶然的联系均有正面效应，但是工作场合的接触则没有这种效应^[2]。以上研究虽然在部分国家证明了部分类型的接触的正面效应，但由于数据限制等原因，并没有说明不同场合、不同人群的不同类型的接触，其实质究竟是什么；接触如果有正面效应，其内在机制究竟是什么；同时在不满足奥尔波特所说的理想条件的情况下，接触的正面效应是否还会存续^[3]。

竞争威胁假设（个体层面与宏观层面）：这一假设强调感知到的或实际遇到的周围或者社会中移民的数量或竞争，本地人对移民负面印象的产生有着显著的影响^[4]。人们往往因为感知到的威胁而对移民产生负面印象，且不管实际威胁是否真的存在^[5]。如 Green 在对 20 个国家的比较研究中发现，所有个体层次的预测变量中，个体感知到的威胁和本地人对于移民负面印象产生有着最强最稳定的关系。此外，控制了个体感知到的威胁以后，收入等社会经济地位变量的作用开始变得显著。与此同时，很多研究也表明，宏观的社会背景环境或者居住环境，同样使个体对待移民或移民现象的态度有显著影响^{[6][7]}（Quillian, 1996; Scheepers et al., 2002），如 Quillian 在研究中以不同地区的平均收入水平，以及黑人比例作为测量实际威胁的变量，发现收入偏低以及黑人比例占比较高的地区，其居民更容易产生对于外来移民的负面印象。

综上，在关于本地人 ATII 的解释中，无论是理性人假设还是竞争威胁假设，均强调本地人与外来移民关于工作机会等经济空间及社会生活空间的争夺而产生的负面印象。其中理性人假设更为关注较低阶层的本地人相较于较高阶层的本地人，经济及社会生活空间更容易受到外来移民的冲击；而竞争威胁假设则更为关注本地人实际遇到的或感知到的外来移民的竞争或威胁对于其负面的 ATII 的影响^[8]（Ceobanu, 2009）。相对而言，接触理论更为强调与外来移民接触或联系给群体关系带来的积极作用，同时这一理论有着较为严格的限定条件，不同条件下不同类型的接触所发挥的具体作用仍有待探讨。

1. 对上述理论解释的反思 在对西方学界关于本地人 ATII 产生机制所进行研究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我们提出针对上述解释的两点反思：

首先，理论解释机制存在的模糊性，如理性人假设和竞争威胁假设在解释为何低阶层的人士以及感知到移民数量越多的人士更容易产生负面 ATII 时，均从本地人与外来移民经济空间、社会生活空间及文化空间的争夺的视角出发，认为低阶层和感知到移民数量多的人士更容易受到这种争夺的威

[1] McLaren, Lauren M. 2003 'Anti-immigrant prejudice in Europe: contact, threat perception, and preferences for the exclusion of migrants', *Social Forces*, vol. 81, no. 3, pp.909-36.

[2] Escandell X, Ceobanu AM. 2009. When contact with immigrants matters: threat, interethnic attitudes and foreigner exclusionism in Spains Comunidades Autonomas. *Ethn. Racial Stud.* 32(1):44-69.

[3][8] Ceobanu, Alin M. and Xavier Escandell. 2010. "Comparative Analyses of Public Attitudes toward Immigrants and Immigration Using Multinational Survey Data: A Review of Theories and Research."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36:309-328, 309-328.

[4] Green EGT. 2009. Who can enter? A multilevel analysis on public support for immigration criteria across 20 European countries. *Group Process. Intergroup Relat.* 12(1):41-60.

[5] Jackson, L. M., & Esses, V. M. (2000). Effects of perceived economic competition on people's willingness to help empower immigrants. *Group Processes & Intergroup Relations*, 3, 419 - 435.

[6] Quillian L. 1995. Prejudice as a response to perceived threat: population composition and anti-immigrant and racial prejudice in Europe. *Am. Sociol. Rev.* 60(4):586-611.

[7] Scheepers P, Gijbbers M, Coenders M. 2002a. Ethnic exclusionism in European countries: public opposition to civil rights for legal migrants as a response to perceived group threat. *Eur. Sociol. Rev.* 18(1):17-34.

胁。这种相对综合的解释,其合理与科学性是建立在西方成熟的移民社会的语境下的,在这些国家,一方面经过多年的外来移民与本地人的相处,外来移民在经济以及社会生活等诸多方面均逐步嵌入在当地社会之中,与本地人形成了统一而稳定的关于外来移民的综合印象;另一方面,由于迁入这些国家的移民多为非技术人员,从事的多为低端的制造业或者服务业^[1],且多生活在成本较低的低阶层社区,他们的经济活动与社会生活空间具有高度的重合性,因此对于这些国家的本地居民而言,低阶层的本地居民更容易感知到更多的移民数量。正是满足这两个基本条件,上述理论解释尽管没有区分外来移民经济空间、社会生活空间等的不同,但仍在相关西方国家的实证研究中得到了一定的验证。但对于移民初期社会,由于外来移民在经济、社会生活等方面不同的嵌入程度,以及移民的经济活动和社会生活空间并不一定完全一致,因此上述假设的解释力可能会有所折扣,这也部分解释了为何社会经济地位等变量在东欧以及中国等移民初期国家对于 ATII 都没有显著影响的原因^[2]。

其次,不同解释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张力。以接触理论和竞争威胁假设为例,接触理论强调同外群体成员的接触对于正面 ATII 的显著效应,而竞争威胁假设则认为感知到的移民数量越多,越容易产生更为负面的 ATII。而一般而言,一个社会中的移民数量越多,人们越容易感知到较大的移民数量,从而产生负面 ATII;然而,一个社会中的移民数量越多,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本地人与移民之间的接触的机会(更多的表现为偶然的接触或接触机会的增多),从而容易产生正面的 ATII。以上可以看到这两个假设间所呈现矛盾,这当然可能是由于竞争威胁假设是综合的包括经济空间、社会生活空间及文化空间等多方面的威胁,而接触假设中有着严格的限定条件,同时不同类型接触的实质也需要澄清;但这些矛盾和张力背后更为深层次或更为准确的原因仍有待通过实证数据进行的验证,以进一步厘清各个理论解释的适用范围以及更为清晰的理论内涵。

2. 广州非洲裔的基本特征 关于本地居民 ATII 的理论解释,其所存在的内在解释机制的模糊性,以及各个理论之间的内在张力,对于西方经济发达且有较长移民传统的国家而言,由于本地人逐步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对待移民及移民现象的态度,同时外来移民本身经济空间与社会空间又高度重合,因此,往往不会影响其理论解释能力,但对于东欧、中国等移民历史较短的国家,了解移民的基本特征以及本地人对于移民及移民现象的印象结构,从而进一步构建合适的理论解释框架就非常重要。

以广州为例,李志刚等学者使用“跨国社会空间”分析广州小北路族裔经济区的形成,他们观察到非洲裔在广州采购货物,然后回到本国销售,其经济活动均在自己的种族之中进行^[3],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这些非洲移民并未进入中国劳动力市场。同时,不像西方国家的外来移民多从事相对低端的制造业和服务业,在广州非洲人以经商、贸易为主,因此与很多西方发达国家不同,非洲人很少挤占本地底层人民的工作机会。基于以上特征,我们称非洲人在广州的经济空间嵌入情况为正向弱经济空间嵌入。

另一方面,从社会及生活空间的角度来看,大量非洲人进入广州,他们在小北路、番禺及海珠等地形成了一系列聚集区,同时由于政府管控、与当地居民关系等原因,这一群体又经常发生迁移,有着高

[1]Escandell X, Ceobanu AM. 2009. When contact with immigrants matters: threat, interethnic attitudes and foreigner exclusionism in Spains Comunidades Autonomas. *Ethn. Racial Stud.* 32(1):44-69.

[2]李志刚等:《全球化下“跨国移民社会空间”的地方响应——以广州小北黑人区为例》,〔北京〕《地理研究》2009年第4期。

[3]Coenders M, Scheepers P. 2003. The effect of education on nationalism and ethnic exclusionism: an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Polit. Psychol.* 24(2):313-43.

[4]李志刚等:《广州小北路黑人聚居区社会空间分析》,〔北京〕《地理学报》2008年第2期。

度的流动性^[1],因此不可避免的会对本地居民的社会、生活空间造成一定的挤压,如许涛等在研究中均提及非洲裔的到来使大量居民或租户迁出原来居住的社区^[2],即使是与非洲移民有生意往来的商户,也经常提及由于文化及习惯差异,会与非洲人发生一定的冲突或摩擦^[3]。同时,值得注意的是,与西方国家不同,广州非洲裔居民并非大量生活于低成本社区,因此并不像西方国家那样主要是低阶层人群会感知到社会、生活空间受到挤压,而是跟居住地有关,非洲裔聚集地附近本地人均有较大可能感知到的社会、生活空间受到挤压,我们称以上情形为负向强社会空间嵌入。

二、本文的理论视角与研究假设

综上所述,广州非洲裔移民并非像西方国家移民那样,对本地低阶层人群形成经济空间以及社会生活空间的双重挤压,相反一方面广州非洲裔移民并未真正进入中国劳动力市场,另一方面就其居住空间而言,非洲裔移民并非大量居住于低成本社区,因此,并非单纯对低阶层本地人的社会生活空间造成挤压。非洲裔移民在广州经济空间和社会生活空间的独特特点,以及这一群体本身高度的流动性,决定了本地人难以形成对于非洲裔移民稳定而统一的印象,而是在某些非洲人嵌入程度较高的领域印象深刻,在某些非洲人嵌入程度较少的或者未嵌入的领域印象较为模糊,同时印象是趋于正面还是趋于负面也存在差异,以上我们称之为本地人对于移民或移民现象(ATII)的印象结构。区分具体的印象结构不仅更符合广州本地人与非洲裔的实际互动情况,同时在理论上也有助于厘清在移民初期社会,基于西方语境提出的相关理论假设对于ATII解释的适用范围以及真正内涵。

如图1所示,本文主要关注本地人对于移民或移民现象的两个方面的印象:一方面是经济影响印象,即本地人如何评估非洲裔大量进入广州对经济方面产生的影响;另一方面是社会生活空间印象,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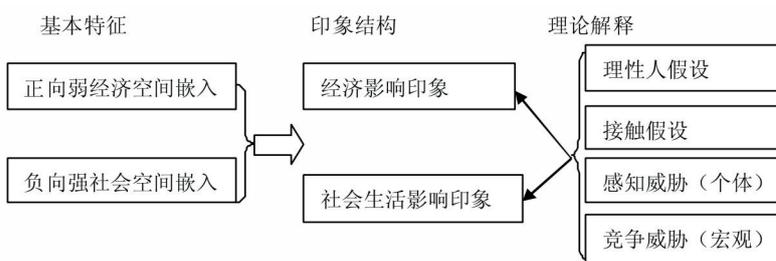


图1 本文解释框架图

本地人认为非洲裔对于社会生活空间产生的影响。根据文献综述及广州非洲裔移民的基本特征可知,由于在广州非洲裔移民经济空间和社会空间嵌入程度以及影响均有较大不同,本地人对于非洲人经济空间印象和社会生活空间印象有着完全不同的生成机制,我们提出第一个基本假设:

假设1(印象结构差异假设):广州本地居民对于非洲人经济影响印象和社会生活影响印象,有着不同的解释机制。

具体而言,对于经济方面影响的印象,由于广州非洲裔的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远未嵌入到广州的经济生活中,同时以经商为主,很少挤占本地低阶层人士的工作机会,这就造成了本地人对于非洲人经济空间印象不够深入,且不同群体间变异较小。因此,基于西方语境下提出的微观层面的假设很可能不适用于与对经济层面印象的解释,由此我们提出第二组假设:

假设2a(理性人假设):个体社会经济地位的高低,对于本地人看待非洲裔经济影响印象没有显著影响。

[1]柳林等:《在粤非洲人的迁居状况及其影响因素分析——来自广州、佛山市的调查》,〔北京〕《中国人口科学》2015年第1期。

[2]许涛:《广州地区非洲裔居住功能区的形成过程与机制》,〔广州〕《南方人口》2012年第3期。

[3]李志刚等:《广州小北路黑人聚居区社会空间分析》,〔北京〕《地理学报》2008年第2期。

假设2b(感知威胁假设):人们感知到的非洲裔数量大小,对于本地人看待非洲裔经济影响印象没有显著影响。

假设2c(接触假设):由于非洲裔移民并非真正进入广州劳动力市场,与非洲裔有接触,并不一定带来更为正面的经济空间印象。

假设2d(宏观层次的竞争威胁假设):人们居住地是否靠近非洲裔聚集区,同样由于经济上的非竞争关系,对于本地人看待非洲裔经济影响印象没有显著影响。

关于社会生活空间的印象则相对复杂,首先理性人假设,该假设认为低阶层人士更容易感知到外来移民对于其工作、社会生活空间的威胁而产生负面印象,但就广州而言,非洲裔并非大量生活于低成本社区,因此以阶层来解释本地居民对于非洲裔社会生活空间印象的不同可能是不显著的,由此得出假设3a:

假设3a(理性人假设):个体社会经济地位的高低,对于本地人看待非洲裔社会生活影响印象没有显著影响。

其次由于非洲裔大量进入广州,确实容易对周围本地人的社会生活空间造成了挤压,因此感知到的非洲裔数量越大或者居住在非洲裔聚居区附近的本地人,更容易产生对非洲裔社会生活影响的负面印象,因此根据竞争威胁理论分别得出假设3b和假设3c:

假设3b(个体层次的感知威胁假设):人们感知到的非洲裔移民数量越大,越容易产生对于该群体的负面社会生活影响印象。

假设3c(宏观层次的竞争威胁假设):人们居住地越靠近非洲裔移民聚集区,越容易产生对于该群体的负面社会生活影响印象。

最后,接触假设认为不同群体成员间的接触有利于增加正面效应,但有着较为严格的限定条件(即接触双方地位平等、双方相互合作、有共同的目标以及官方对于不同族群间交往的认同),而对于社会生活影响的印象,由于跟非洲裔有接触的本地人中,有相当大的可能其社区、生活空间受到挤压,因此在这种相对紧张的环境下,接触究竟能否发挥正面作用,也有待进一步的数据验证。基于此,我们提出两个竞争性假设3d与3e:

假设3d:与非洲裔移民的接触,有利于产生对于非洲裔移民的正面社会生活影响印象。

假设3e:与非洲裔移民的接触,难以产生对于非洲裔移民的正面社会生活影响印象。

三、数据、变量与方法

1. 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来自于周敏教授主持的“广州市民对在穗非洲黑人种族态度研究”项目,该项目采用配额抽样与立意抽样相结合的方法,共调查550个样本,其中有效问卷513份,有效率为93.9%。样本界定年龄在18到69岁之间的广州市民,或在广州居住五年以上的年龄在18到69岁之间的外来人口。调查的群体主要包括普通市民、在校大学生、商贸业主以及有5年以上工作经历的商业服务人员。

2. 变量说明 (1)因变量:本研究重点关注广州本地人对于在广州非洲裔的印象结构,而印象结构主要包括对于经济空间的印象以及对于社会生活空间的印象两种分类,本文所使用的数据中并没有直接关于这两个方面的问题,但问卷中设置了9个关于非洲人聚居对广州影响的表述,让被访者对这些表述进行评价(分为非常赞同、赞同、一般、不赞同及非常不赞同5个选项),而这9个表述多与经济和社会空间有关,因此本文基于被访者对于这9个表述的不同评价结果进行因子分析,从而得出具体的印象结构(9个表述的具体内容及因子分析结果见表2)

表1 自变量基本情况列表

变量分类	变量	频次统计(N=515)
控制变量	性别	1男(263) 0女(252)
	户口类型	0本市户口(335) 1外地户口(180)
个体社会经济地位	教育程度	0初中及以下(98) 1高中(包括中专、技校)(134) 2大专及以上(281)
	职业类型	0无业(19) 1一般职员(76) 2商服人员(40) 3白领(142) 4公务员(17) 5自雇(89) 6学生(126)
感知威胁(个体)	感知到非洲人口数量	1不会超过5000(44) 2五千到一万(108) 3一万到五万(166) 4五万到十万(85) 5十万到十五万(29) 6十五万到二十万(10) 7至少二十万(20)
接触理论	接触类型	0无接触(406) 1与非洲人有生意往来(40) 2有非洲朋友(49) 3既做生意又有朋友(20)
实际威胁(宏观)	是否住在小北附近	0不住在小北附近(373) 1住在小北附近(130)

(2)自变量:表1是关于本文所涉及的主要自变量的基本情况列表,其中:一是个体社会经济地位。在以往研究中,个体社会经济地位是预测本地人ATTI的重要变量,而这些研究多以教育、职业或者收入来代表社会经济地位。考虑到人们在回答收入时候的不准确性,本文个体社会经济地位主要包括两个测量指标:教育和职业。

二是个体层次的感知威胁。本文使用被访者认为的在广州非洲人的人口数量,来测量感知威胁,被访者认为在广州非洲人人口数量越多,代表感知到的威胁越大。由于各选项有一定的顺序且数量较多(7个),在模型中作为连续变量处理。

三是接触。接触按照亲密程度和频率可分为公共场合的接触、居住小区的接触、工作场合的接触、有生意往来及有朋友关系等不同的类型。本文选用有黑人朋友、与非洲人有生意往来这两个相对稳定的接触指标,形成无接触(0)、有生意往来但无朋友(1)、有朋友但无生意往来(2)、既有朋友又有生意往来(3)的四分变量。

四是宏观层次的竞争威胁。以往研究多使用宏观经济条件(如所在地区的GDP)以及该地区具体移民数量来测量实际的竞争,受限于数据,本文使用是否居住在小北地区来测量实际的竞争,居住在小北地区(小北地区为非洲人在广州的主要居住地)代表实际的竞争更大。

除以上核心变量外,本文还将年龄、性别、户口类型等作为控制变量。

3. 数据分析与方法 数据分析主要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通过对相关变量进行因子分析,得出具体的印象结构;第二部分我们使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来检验不同的印象结构的具体生成机制;第三部分考虑到接触理论部分可能存在的自选择偏误,我们使用teffects aipw模型对结果进行校正,以得到更为真实的影响效应。

四、实证结果分析

1. 生成印象结构因子 本地居民感知到的非洲裔对于其经济空间和社会生活空间的影响虽然是两个不同的方面,但若将相关指标简单相加来测量,则往往会存在较强的相关性。为解决上述困扰,本文首先在数据中找到与本地人对于非洲人进入广州带来的社会、生活以及经济等方面影响的相关指标,进行正交因子分析,以形成本地人对于非洲人进入广州的社会生活印象因子和经济空间印象因子,由于两个因子是正交因子,故两者相关程度极小。

表2是运用主成份分析法,对测量广州本地人对于非洲人对广州经济、社会及文化等方面影响的评价的9个指标进行因子分析,经过正交旋转,得到三个特征值大于1的本地人印象因子,其中因子一主要由“非洲人进入给广州带来更多不良的社会问题”、“非洲人带进来许多疾病和不良的生活习惯并威胁着中国人的健康”、“与广州市民混居在同一社区会对社会治安不利”、“黑人的进入使广州的吸毒

表2 正交旋转后各变量因子负载

测量指标	正交旋转后的因子负载		
	因子一(社会生活影响印象因子)	因子二(经济影响印象因子)	因子三
非洲人进入给广州带来更多不良的社会问题	0.7856	-0.1524	0.0106
非洲人带进来许多疾病和不良的生活习惯并威胁着中国人的健康	0.717	-0.2177	0.1891
非洲人进入为广州市的经济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	-0.2594	0.7468	0.0041
非洲人进入可以促进广州市多元文化的发展	-0.1122	0.7897	-0.1356
非洲人进入可以促进广州市的全球化建设	-0.0259	0.8519	-0.1064
与广州市民混居在同一社区会对社会治安不利	0.7302	-0.0795	0.1267
不允许黑人通过与中国人结婚的途径来获得永久居住权	0.0512	-0.0993	0.8484
在广州,不应该授予黑人永久居住权或公民权	0.2311	-0.0852	0.818
黑人的进入使广州的吸毒贩毒问题越来越严重	0.7538	-0.0421	0.2393
特征值	2.36916	2.00297	1.52784
变异比	0.2632	0.2226	0.1698

贩毒问题越来越严重”,这几个与本地社会问题、社会治安及生活空间高度相关的指标构成,我们称之为“社会生活影响印象因子”;因子二则主要涉及的是本地人关于非洲移民对本地经济影响的评价,我们称之为“经济影响印象因子”;因子三主要涉及本地人对于非洲人获得永久居住权的看法,因本研究主要讨论经济影响印象和社会生活影响印象,故在此暂不作讨论。

2. 两种印象结构的具体形成机制分析 因本研究主要关注经济空间印象与社会生活空间印象分别的生成机制及其对比,故下面我们将这两个印象分别建立模型,以具体分析不同印象结构的形成机制。

表3通过五个模型对第二组假设(假设2a、假设2b、假设2c)进行验证,第一个基础模型显示居民的年龄、性别均对经济空间印象因子没有显著影响,值得注意的是户口变量,非广州户口的居民对非洲裔移民的经济方面的印象比广州本地户口的居民更差,但这种效应在控制个体社会经济地位等变量后变得不显著;第二个模型^[1]检验了受教育程度对于经济空间印象因子的影响,大专及以上学历的人

表3 经济空间印象因子形成机制分析

变量	基础模型	个体社会经济地位模型	感知威胁模型	接触模型	居住地模型
年龄	-0.0336	-0.0234	-0.00706	-0.0074	-0.0111
年龄平方	0.00033	0.000249	0.00004	0.00005	0.000108
性别(女性为参照项)	0.0603	0.0569	0.0704	0.0621	0.0671
户口(本地户口为参照项)	-0.177*	-0.0938	-0.0497	-0.0705	-0.0775
受教育程度(初中及以下为参照项)					
高中及中专		0.108	0.167	0.158	0.163
大专及以上学历		0.267*	0.353**	0.359**	0.362**
感知到的在广州非洲人数量			-0.00331	-0.0036	-0.00919
接触类型(以无接触为参照项)					
有与非洲人做生意				0.03	0.0329
有非洲朋友				-0.13	-0.132
既做生意又有朋友				0.274	0.274
是否住在小北地区(不住在小北为参照项)					0.0126
常数项	0.737*	0.298	-0.0607	-0.0475	0.0147
样本量	513	511	458	458	448
R-squared	0.021	0.028	0.028	0.033	0.033

注:(1)因子值越大代表对非洲裔移民经济影响的印象越正面

(2)** $p < 0.01$, * $p < 0.05$, $p < 0.1$

[1]在个体社会经济地位模型中,我们同时检验了工作类型(分为无业、自雇、商服人员、普通职员、白领、公务员及学生等7种类型)对经济空间印象因子的影响,结果显示各工作类型间人们对非洲裔移民的经济空间印象因子无显著差异,考虑到可能与受教育程度存在较大的相关性,故没有放入工作类型变量。

相比于初中及以下学历的人更容易认同非洲裔移民在经济方面给广州带来的积极影响(这种效应在放入其他解释变量后,仍然显著),而高中(包括中专、技校)学历的人则与初中及以下学历的人无明显差异。后三个模型则分别检验了感知威胁、接触理论以及实际威胁三个理论假设对于本地人经济空间印象的影响,结果显示,这三个变量无论是人们感知到的非洲裔移民的数量大小、与非洲裔移民有无接触以及居住地是否靠近非洲裔聚居区均没有影响人们对于非洲裔移民经济方面的态度,且各个模型的解释力均较差。因此表3基本验证了第二组假设,即由于在广州非洲裔移民经济区的逐步形成,他们并未真正进入中国劳动力市场,也没有威胁到低阶层人群的工作机会,而这种基本特征也在本地人的态度里得到了反映,不同于西方成熟移民国家,社会经济地位低、感知到的移民数量大、没有接触非洲移民或者是居住地靠近非洲人聚居区并不会使人们产生对于非洲人经济影响方面的负面印象。

表4 社会生活影响印象因子形成机制分析

变量	基础模型	个体社会经济地位模型	感知威胁模型	接触模型	居住地模型
年龄	0.0643***	0.0680***	0.0414	0.0321	0.0215
年龄平方	-0.000614*	-0.000657**	-0.000301	-0.000179	-0.00005
性别(女性为参照项)	-0.0775	-0.0859	-0.12	-0.124	-0.118
户口(本地户口为参照项)	-0.136	-0.124	-0.141	-0.200*	-0.186*
受教育程度(初中及以下为参照项)					
高中及中专		0.06	-0.076	-0.0391	-0.031
大专及以上		0.0535	-0.11	-0.0338	-0.0381
感知到的在广州非洲人数量			0.157***	0.155***	0.136***
接触类型(以无接触为参照项)					
有与非洲人做生意				0.530***	0.540***
有非洲朋友				0.14	0.131
既做生意又有朋友				0.163	0.124
是否住在小北地区(不住在小北为参照项)					0.230**
常数项	-1.284***	-1.396***	-1.290***	-1.221**	-1.029**
样本量	513	511	458	458	448
R-squared	0.057	0.059	0.104	0.122	0.132

注:(1)因子值越大代表对非洲裔移民经济影响的印象越负面

(2)** $p < 0.01$, * $p < 0.05$, $p < 0.1$

表4进一步对第三组假设进行检验,基础模型显示,年龄对于社会生活印象因子的影响呈倒U型,拐点为52.4岁,即年龄在52岁左右的本地人相对而言认为非洲裔给广州带来的社会生活方面的影响最为负面。另外两个控制变量性别、户口则对社会生活印象因子没有显著影响。第二个模型^[1]则验证了假设3a,即个体社会经济地位对于社会生活印象因子没有显著影响。感知威胁模型结果表明,本地人感知到的在广州的非洲人人数越多,他们越容易认为非洲移民会挤压社会生活空间,进而产生更为负面的社会生活影响印象,这种显著的负面效应在加入接触变量以及居住地变量后仍然显著。第四个模型对接触假设进行检验,结果表明,人们对于非洲移民社会生活影响的印象是否趋于负面,与接触类型有关,有与非洲人有生意往来的人更容易产生更为负面的社会生活影响印象,而有非洲朋友以及既做生意又有朋友也同样容易导致负面的社会生活影响印象的产生,但这种效应并不显著,这就否定了假设3d,而部分验证了假设3e。最后来看居住地模型,模型结果显示住在小北地区的人相比于不住在小北地区的人,更容易产生负面的社会生活影响印象,这是因为由于大量非洲人

[1]同表2一致,表3的个体社会经济地位模型,我们同时检验了工作类型(分为无业、自雇、商服人员、普通职员、白领、公务员及学生等7种类型)对社会生活影响印象因子的影响,结果显示各工作类型间人们对非洲裔移民的经济空间印象并无显著差异,基于同表二同样的考量,故没有放入工作类型变量。

聚集于这些社区,因此这些社区的人们社会生活空间更容易受到挤压,而这也与假设3c相符。

可以看到在上述针对社会生活影响印象的解释中,个体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是不显著的,而感知威胁以及居住地变量则有着显著的影响,这与广州非洲裔移民的居住结构有关,他们并非像西方国家那样生活在低成本社区,因此相比于个体社会经济地位,人们实际遇到的威胁以及感知到的威胁成为更有解释力的变量。接触造成的影响则十分有趣,人们与非洲人有生意往来反而更容易形成负面的社会生活影响印象,这与在西方国家研究中所发现的接触的正向效应不符,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广州双方的生意往来是基于本地商人社会、生活空间受到挤压的大前提下的,因此双方即使是紧密的接触没有带来正向效应也是可以理解的。而这恰恰与在中国的经验观察相符,如很多商户们都有与有生意往来的非洲人发生摩擦与冲突的经历,他们认为非洲人往往小气而自私,虽然愿意有生意往来,但不愿有任何其他的接触^[1]。

3. 解决内生性问题的尝试 通过表3我们可以观察到不同接触类型对于社会生活影响印象的作用,需要注意的是,这一效应可能存在自选择偏误。自选择偏误是指主解释效应/因变量在某种程度上被个人选择所决定(陈云松,2010)。具体到本研究,即人们并非随机的选择与非洲人接触,是否接触以及哪种类型的接触受到教育程度、职业类型、居住地、本身性格等多方面的影响,因此若不消除个体异质性带来的偏差,得到的结果往往是有偏的。学术界逐渐提出一系列消除此类选择偏差的模型,如增强逆概率加权(Augmented inverse-probability weighting, AIPW)模型。增强逆概率加权处理效应模型是对于逆概率加权(IPW)模型的改进,其核心原理是综合利用加权倾向值方法和回归方法,得出广义倾向值估计量(AIPW),从而在IPW模型结果可能有偏的情况下对其结果进行矫正。公式如下:

$$T_{aipw} = \frac{1}{n} \sum_{i=1}^n \left\{ \frac{\left[\frac{r_i t_i y_i}{\hat{e}(x_i)\pi(x_i)} - \frac{r_i(1-t_i)y_i}{(1-\hat{e}(x_i))\pi(x_i)} \right]}{-\frac{t_i - \hat{e}(x_i)}{\hat{e}(x_i)(1-\hat{e}(x_i))} \left[\frac{1-\hat{e}(x_i)}{\pi x_i} \hat{E}(r_i y_i | t_i = 1, x_i) + \frac{\hat{e}(x_i)}{\pi x_i} \hat{E}(r_i y_i | t_i = 0, x_i) \right]} \right\}$$

其中 t_i 表示个体 i 是否属于控制组或对照组, $t_i = 0$ 时,表示 i 处于对照组, $t_i = 1$ 时,表示 i 处于控制组。 x_i 为解释变量, $y_i(0)$ 表示 i 在对照组的情况, $y_i(1)$ 表示 i 在控制组的情况。 $r_i = 0$ 时,表示个体 i 时观察不到因变量, $\hat{e}(x_i)$ 为倾向值, $\pi(x_i)$ 为缺失概率。由公式可知,当 $\hat{e}(x_i)$ 即倾向值接近 0 时,公式如

$\frac{r_i t_i y_i}{\hat{e}(x_i)\pi(x_i)}$ 部分会变大,使得处理组和对照组达到更为稳健的平衡。

值得注意的是以往的模型多基于二元干预,而 Cattaneo、Imbens 等发展了解决多值干预的模型^{[2][3]},通过这一模型,我们可以评估不同类型的接触相对于无接触,对于社会生活影响印象的真实效应。

表5的结果显示,无接触(控制组)时,人们的初始印象因子值为1.836701,而与非洲人有生意往来比无接触显著增加0.7754778,因此表3的回归分析结果低估了有生意

表5 tteffects aipw 模型分析结果

	接触模型 Coef.
平均处理效益(ATE)	
接触类型	
与非洲人有生意往来 vs 无接触	0.7754778***
有非洲朋友 vs 无接触	0.174048
既做生意又有朋友 VS 无接触	-0.0113412
基准的处理效益	
接触类型	
无接触	1.836701***

注:***p<0.01, **p<0.05, *p<0.1

[1]李志刚等:《全球化下“跨国移民社会空间”的地方响应——以广州小北黑人区为例》,〔北京〕《地理研究》2009年第4期。

[2]Cattaneo, M. D. 2010. Efficient semiparametric estimation of multi-valued treatment effects under ignorability. Journal of Econometrics 155: 138-154.

[3]Imbens, G. W. 2000. The role of the propensity score in estimating dose-response functions. Biometrika 87: 706-710.

往来这种接触类型对于负面社会生活影响的效应。同时,有非洲裔朋友以及既有生意往来又有朋友与表3结果一致,均无显著效应。

由于使用上述干预模型,需要满足“重叠假定”(overlap assumption),即 x 的每个可能的取值上都同时存在处理组和控制组的个体,图2对“重叠假定”的检验结果显示,处理组与控制组的子样本存在较大规模的重叠,可以进行匹配,因此满足“重叠假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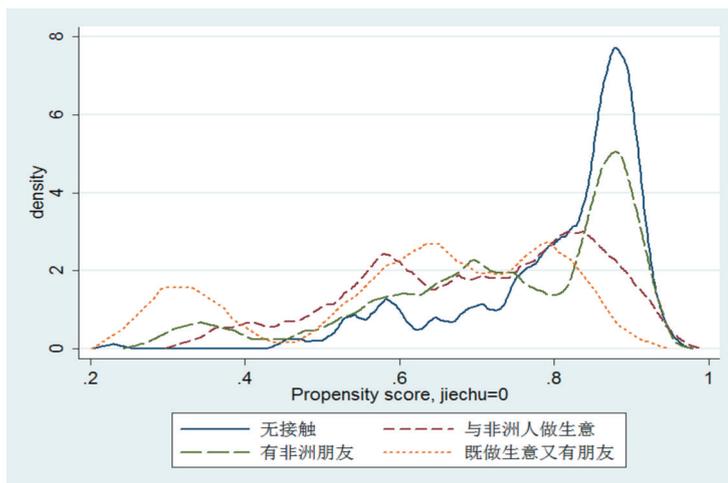


图2 重叠假定检验图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在梳理西方以往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现有的关于本地人对移民或移民现象的态度的理论解释,其合理与科学性是建立在西方成熟的移民社会的语境下的,在这些国家,一方面本地人形成了统一而稳定的关于外来移民的综合印象;另一方面,由于迁入这些国家的移民多为非技术人员,从事的多为低端的制造业或者服务业,居住于低成本社区,因此外来移民形成了对于本地低阶层居民经济及社会生活空间的双重挤压。而发展中国家或者移民初期国家,其外来移民则有着不同的经济嵌入程度以及不同的社会生活空间,本地人也未形成统一而稳定的关于外来移民的综合印象,而这也解释了在一些比较研究或者针对初期移民国家的研究中,基于西方语境下提出的理论解释没有显著效应,甚至有着完全相反的作用机制。

为解决上述难题,本文根据广州非洲裔移民“正向弱经济空间嵌入”、“负向强社会空间嵌入”以及本地人未形成统一而稳定的关于外来移民的综合印象等基本特征,提出区分广州本地人对于非洲裔移民的不同印象结构,进而具体分析不同印象结构其具体生成机制。实证分析结果显示,由于非洲裔移民并未真正进入广州劳动力市场,且以经商为主,不同人群对于非洲裔移民经济影响方面的印象并无明显差异;而社会生活影响的印象则主要由人们实际遇到的威胁以及感知到的威胁所决定,人们感知到的非洲裔数量越大或者居住地越靠近非洲聚集区,越容易产生负面的社会生活影响印象,同时与非洲族裔有接触也并没有发挥正面效应。因此通过我们的研究可以发现,在初期移民国家,根据当地实际特点,区分本地人关于移民的具体印象结构,有助于发掘真实的本地人关于移民印象的产生机制,同时有助于厘清基于西方国家语境提出的各个理论解释的适用范围以及更为清晰的理论内涵。

本研究的不足之处是由于数据限制,仅基于广州的情况进行了探讨,而这就无法进一步探讨不同宏观因素(如GDP及移民占当地人比例)对于本地人对待移民印象的具体影响,因此在未来的研究中,收集基于多城市的人们关于移民态度的追踪数据,进而研究全面而动态的移民印象产生机制是非常必要的。

[责任编辑:方心清]